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2.007

童书中的意识形态及其批判潜能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与趋向

赵霞

(浙江外国语学院 教育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观念与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迅速发展,“意识形态批评”随后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术语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彼得·霍林代尔为代表的研究为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开荆辟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约翰·斯蒂芬斯为代表的研究深化了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观念与认识,丰富和拓展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独创性,典型地体现在关于“儿童/成人”意识形态关系的审视与思考中。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儿童文学界对儿童文学/文化文本中“儿童/成人”关系的认识,继而改写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创作、阅读、批评的观念与实践。

关键词: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儿童/成人;西方文学;批判思维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2-0050-08

意识形态作为人的一切观念意识的广义总称,或者说,作为人类意识存在的结果与证明,它渗透在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包括文学活动,当然也包括儿童文学。引人深思的是,在儿童文学领域,意识形态的影响既以格外鲜明的方式存在,又长久地遭到忽视。1999年,彼得·亨特在其主编的《理解儿童文学》一书相关章节的“编者按”中这样写道:“过去20年来批判思维与教学的最根本转变之一,就是接受意识形态并非‘被’文本‘运载’的抽离概念,而应该说,所有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渲染。儿童文学正好是最难接受这一改变的领域,因为大家仍普遍假设,儿童文学应该‘纯真’得不必关心性别、种族、权力等——或者应该只去传达被设计得很透明的信息。”^{[1]56}如果说对于儿童文学意识形态内容的或显或隐的认识,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儿童文学批评的历史,那么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迅速发展才开始引起儿童文学界的关注的^{[2]359-371}。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主要目的,并非意在指认儿童文学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

而是为了揭示儿童文学文本中那些与文学本体,尤其是与文学语言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讯息,继而通过这样的揭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写作、阅读与批评。

广义地看,儿童文学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是意识形态批评的构成部分。本文并不涉及这些具体的批评分支,而是从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的角度,对其在西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特点、理论与走向,展开分析与评述。

一、意识形态批评的三个层次

萝宾·麦考伦与约翰·斯蒂芬斯在其关于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研究进程的扼要概括中,将鲍勃·迪克森出版于1977年的两卷本“抓住孩子”(Catching Them Young)系列,视为早期儿童文学意识形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2]359}。该系列由《儿童小说中的性、种族与阶级》《儿童小说中的政治观念》两册构成,意在考察“作家想要透过儿童小说、故事传递的观念、态度、想法”,以及“他们完成这一切的方式”^{[3]xiii}。事实上,迪克森这里

收稿日期:2023-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16CWW029)

作者简介:赵霞(1981—),女,浙江上虞人,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所说的“方式”,主要还是从表层内容角度对作品展开的观念分析,这是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批评借助性别、种族等话题开始在儿童文学领域初步兴起的研究成果。

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发展演进中,彼得·霍林代尔的《童书与意识形态》(1988)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该文于1988年1月在《讯号》杂志刊发,几乎在同一时间,由出版《讯号》的Thimble出版社出版。这是西方儿童文学界第一部专论童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著。霍林代尔对既有的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其意识形态解读一方面太过偏狭,另一方面则太过表面。前者体现在相关批评中常执的两极思维模式(一方对抗或取代另一方),后者主要就其批评方法的不足而言。霍林代尔提醒人们关注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文本发生关联的复杂性。他认为,那些迄今为止围绕着儿童文学产生的各类代表性的意识形态框架,构成了我们写作、接受、评价儿童文学的复杂语境。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批评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某种框架表示支持或反对,而是意在“证明意识形态是发生在儿童与书籍之间的这场交往当中不可避免、无法驯服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控制的因素,这是因为‘书本与儿童’及其所处的社会世界充满了多层性和多维性,这其中,每一引诱人的抽象概括都呈现为无数个体的形态”^{[4]10}。“在童书世界里,首要的任务不是去加强意识形态,而是去理解它,以及帮助人们——包括孩子们——理解它。”^[4]

基于内容与技术的双重考虑,霍林代尔提出了意识形态存在于儿童文学文本的三种方式,或者说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家试图借作品传递给孩子的有关对社会、政治与道德信仰的认识。这是作品中最显而易见也最易于辨识的意识形态层次,在早期儿童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第二个层次,霍林代尔称之为“消极意识形态”(passive ideology),其内容潜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却并未成为文本有意识地想要表达的目的。在霍林代尔看来,这个层次的意识形态虽然是潜在的,却对儿童读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或者说,这类在作者的意识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讯息,往往才是文本中关键的意识形态内容。霍林代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层次,进一步超越了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作家的意识范围,走向语言作为一种无所

不在地塑造、规范个体的话语的性质。这里,福柯的影响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时候,我们都是他人意义的驯服的囚徒”^[4],同样,“儿童文学作家通常并非传达其独特自我的媒介,而是其所处世界的传达媒介”^[4]。

霍林代尔的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儿童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批评,推进到了更高层次的理论与思考水平。

首先,他所提出的童书意识形态的三个层次,远远超过了从一般的教育视角看待儿童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揭示了童书文本中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复杂性。尤其是对第二、第三层次的揭示,促使人们意识到,儿童文学的文本作为一种意义媒介,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透明、一览无余。通过对这些层次的揭示,我们既看到了童书文本的复杂性,也看到了这一文本解读的复杂性。霍林代尔格外关注童书意识形态的后两个层次,认为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语境下,正是这两个层次上的意识形态内容对作者和读者产生着强大而隐在的影响,从而亟须批评考察的跟进。“有时候,一部小说中显在的表面意识形态会与消极意识形态彼此相左,‘正统’观念受到潜意识思想的反对。”^[4]在这样的细致辨析和寻索中,霍林代尔实际上提出了有关儿童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见解,即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对自我和对世界的控制,都不像他自己以及读者想象的那样轻易、清晰。这一见解不但打开了人们对于当下童书创作的理解,也带来了重观历史文本的新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文学史研究逐渐冲破过去的线性史述传统,开始细察历史文本中意识形态的复杂层次及其内涵,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霍林代尔的贡献。

其次,霍林代尔强调透过表层内容与观念的分析,从文学语言及话语的深层角度探讨和理解童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区别,决定了谈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也须充分考虑文学语言表达的特殊性。他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为例谈到,针对这部反种族主义的作品种族主义批评,恰恰是因为批评者未能充分察觉、把握文学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对于这部富于反讽语言风格的作品而言,很多时候,表层语言传递的语义与背后叙述者试图表达的真实观念,表面看来往往是相悖的。因此,只有在理解文学语言的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才能

真正进入其意识形态表达的內部。同时,从意识形态的第二、三层次来看,叙述者甚至作者本人,也远非作品意识形态最后的控制人。在第二个层次上,作者试图在文本中隐藏的某些意识形态内容,必定会从语言的缝隙中透露出去。在第三个层次上,作者甚至并非文学文本独立的创作发明人,而是一切塑造着他/她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传递者。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作家重写其世界的方式是极其有限的。他有能力(或许也有义务)呈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反映的不是现实,而是他的愿望。但这种创作跟另一种警示性的写作,也就是表现一个作者担忧的当下或可能存在的腐坏世界的写作,面临着同样的束缚。两者都须从同样的当下理解,以及能令儿童读者相信的真实感出发”^[4]。那么,儿童文学的写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我们超越当下生活的现实?如此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界定、思考儿童文学的虚构与现实、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霍林代尔既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个体和文本的影响力,也强调了读者在儿童文学阅读活动中的能动性。长期以来,童书中的观念内容对读者的影响往往被认为是单向的。自儿童文学诞生以来便伴随着它的严格的童书审查制度(censorship),便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体现与落实。霍林代尔的研究指出,“意识形态不是那种把儿童当作空容器倒过去的内容。相反,它是儿童原本就拥有的,是儿童从大量比文学强大得多的经验里得出的内容”^[4]。因此,儿童读者以及作为陪伴者或引导者的成人读者既受到文本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塑造,同时,也可以借助对于文本意识形态运作方式的了解,反读文本,反思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讯息。“通过教会孩子如何发展起一种阅读故事的敏锐快感,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一种能力,去辨识那些更为意义重大的语言的读职。”^[4]霍林代尔就此给出阅读操作建议,包括重思儿童故事的欢乐结局、细察童书中的价值“打包”现象、考察经典童书如何质询和颠覆看似由它们代言的价值观、思考儿童故事中“好”特征与“坏”特征的角色分配、审视童书中的“缺席者”等,促使人们重新看待、理解儿童文学文本的性质、构成与功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改写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传统阅读观念与阅读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朝向文本的反读及其代表的儿童读者的能动参与,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探索

与贡献。

二、意识形态批评的话语分析

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意识形态是无可争议的核心话语。尽管单以意识形态为话题的论著并不多见,但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的基础观念与意识,以及一种充满批判性的批评方法,散布在大量儿童文学的研究论著中。可以说,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界的重要学者,其理论研究无不与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密切关联,其研究发现也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于童书意识形态的认识与理解。

1992年,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斯蒂芬斯出版了《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一书。该书延续了霍林代尔提出的关于童书意识形态的两点基本认识:第一,童书中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第二,存在着显性与隐性的意识形态,后者常常不易察觉,却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斯蒂芬斯沿用了霍林代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三个文本层次的理论。他评价霍林代尔的论文“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探讨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但在研究的范围与方法上相当有限”^{[5]11}。在此基础上,《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一书意在结合语言学与叙事学的解剖方法,从更细致的语言和文本分析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在儿童文学文本中的运作方式。斯蒂芬斯试图用“话语”一词统摄文学文本的一切叙事表达,进而从精细入微的手术式的话语分析中,揭示儿童小说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不同层面的话语编织,传导给它的读者的。从最细小的词汇、句法、对话到对故事的视角、聚焦、结尾处理、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互文性等的细致解剖,其研究生动地诠释了在儿童文学中,“意义不是一个自足语言体系的产物,而是语言、社会以及各种话语之间复杂关联的一部分”^{[5]115}。

斯蒂芬斯的研究影响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不是外在于文学话语的某种价值或意义的添加,它就是话语本身。由此,意识形态分析也不是纯粹观念的分析,而应是最具体细致的文学话语形式层面的分析。相关批评重视在贴近文本的细读分析中揭示文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并逐渐发展起一套日益精细的

意识形态文本话语解读策略。《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即是这方面的典范。这类解读常常从看似传统的叙事语言分析进入,却将我们导向话语表达的另一方向与出口。在针对查尔斯·贝洛、阿瑟·奎勒-科奇、约翰·福尔斯、安吉拉·卡特四个版本的《灰姑娘》故事的比较中,斯蒂芬斯从表面相近的语义表达出发,揭示了话语方式的微妙不同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变化^{[5]97-101}。当文学话语被置于意识形态的显微镜下进行重观,原本熟悉的词句之间的关系,再度变得陌生起来,原本简单寻常、一目了然的语义表达,在文本上下内外话语关系的生发中也变得复杂暧昧起来。

可以看到,这一批评方法不但丰富了文本的解读,也增强了批评本身的趣味。新批评式的细读技巧与另辟蹊径的意识形态解码方法结合在一起,带来了批评发现甚至发明的独特乐趣。从这里开始,西方儿童文学批评进入了又一片广阔的解释天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意识形态的文本细读法在性别批评、种族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批评成了精细的文本手术,其目的不是还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揭示很多不为作者和读者所知的意识形态隐语。这一批评方法带来了儿童文学文本的批评新见,也赋予了批评本身某种冒险式的趣味。

第二,不但重视文字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同样重视图像中的意识形态解读。有别于大多数成人文学文本,图像构成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另一个基本符号与基本内容。由于图像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1988年,佩里·诺德曼在其《说说图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一书中,展示了针对图画书图像叙事的观念内涵的精细分析。在《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中,斯蒂芬斯一方面延续了诺德曼的技术分析,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图画书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与阐述。他认为,图画书中的图画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表达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有些与社会主流观念相一致,有些则对此构成挑战。依据斯蒂芬斯的理论,在儿童文学的阅读中,一切观看都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观看。例如,在他看来,低幼图画书《母鸡萝丝去散步》中除了幼儿语言的初步学习与图文配合的故事趣味,还包含了与儿童社会化进程有关的基础意识形态。由母鸡与狐狸构成的这一反讽叙事中,借助喜剧的幽默传递出

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观念是:不必他人行动,作恶者终将自己受到惩罚。不论母鸡散步中的悠然还是出于无知无觉还是有意为之,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到这一与社会行动相关的意识形态讯息^{[5]162-165}。因此,对儿童读者而言,阅读图画远不仅是对故事讯息的视觉解释,它同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化过程。

这一结合针对童书插图的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儿童文学批评影响深远。考虑到图像符号在儿童文学叙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插图表意的意识形态解读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看待和思考童书的视角,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儿童文学插图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建构。

第三,强调意识形态批评的深层实践意义,致力于通过批评促进儿童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实践。早期意识形态批评大多是在语义表层进行操作的,目的在于揭示儿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其对应的观念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批评持续深入到儿童文学的文字与图像文本深处,不但意在提出针对特定意识形态观念的批判,更试图借此进入一切儿童文学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据此,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由一部分问题文本扩展至儿童文学的一切文本,主要关切也由此前视野中的观念问题拓展至作为文本唯一存在方式的话语问题。由于儿童文学(尤其是低幼儿童文学)的阅读对儿童读者而言意味着基础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建构,作家在创作中运用何种方式、呈现何种观念,便成为了尤其需要谨慎对待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越是进入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深处,我们越是能够看到: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而言,理解童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运作,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将带来丰厚的回报。就创作而言,一方面,正如斯蒂芬斯所说,一切文本的可读性始终建基于我们理解现实的某些共识与表达的某些惯例^{[5]199},通过童书承载、传递这些共识与惯例,构成了儿童文学阅读的基础意义;另一方面,通过“质询文本”(Interrogative text),或者说通过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质询,向某些普遍、公认的共识与惯例发出质疑,提出反思,同样是当代儿童文学意义重大的职责。就阅读而言,意识形态批评倡导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接受领域流行的“反读”文本的观念与潮流——儿童文学文本传递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对应的社会建构观念,

对儿童读者来说并不一定是权威性和决定性的。相反,面对以权威面目出现的一切文本,针对它的“反读”恰恰完成了对权威的反思与反抗。在这样的观念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实践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三、重思“儿童/成人”的意识形态关系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儿童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思考受益于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声名显赫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挪移、复制了这一理论。不论是性别、种族、叙述权威、主体性等问题的提出,还是各种具体的话语批评操作,我们都能从中清楚地看到背后这一理论的支撑。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也以其自身的方式、话语等,丰富了整个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这一点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关于“儿童/成人”意识形态关系的审视与思考中。

如果说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有其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批评的独特之处,或许就在于,其一切批评话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内容,那就是“儿童/成人”的意识形态关系。这是贯穿儿童文学史的一对意识形态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儿童文学这一文类独立的基点——正是基于成人对作为一种观念的“儿童”的想象与建构,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迄今为止一直与儿童文学史相伴的童书审查制度(censorship),即是这一意识形态关系的鲜明体现。通过成人操作的审查制度来控制、规定儿童文学的表达内容,传递的是成人关于儿童及其文学、文化理当如何的观念。现代儿童文学史上,这类审查以书目评定、遴选、荐读等方式,普遍存在于儿童文学的阅读活动中并对其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作为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史的必要构成部分,在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界,童书审查制度较早就开始引起人们关注与反思。早在1974年,玛丽·卢·怀特就提醒学校教育工作者警惕童书审查的危险。在她看来,大量以审查之名实施的阅读禁令,可能反而构成了“对童书的威胁”。当某些童书被简单地划出校园阅读的地界,孩子也被简单地剥夺了讨论、争辩的自由^[6]。与怀特的话语构成呼应,1983年,诺德曼在为《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第8卷第1期撰写的编者按中,以自己的实际

经验和经历为例,提出了对于由于儿童文学教学者本人的观念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特殊的“书籍审查”的反思^[7]。

如果说针对童书审查的早期批评主要体现了一种主要依照“教育者/受教育者”模式建立起来的“儿童/成人”意识形态关系的朴素反思,那么随着意识形态批评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推进,这一批评反思也进一步深入儿童文学内部。帕特里克·香农在发表于1987年第2期《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的《童书社会与政治观念的无意识审查》一文中提出了对于一种隐性的童书审查观念与方式的警惕。他指出,审查制度常常公开表现为“一个群体以‘正确思想’的名义,限制另一些讲述、观看、倾听、阅读和写作,因其包含了污浊、暴力或破坏性的观念”。但在这种公开的审查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类隐秘的审查,那是社会或政治观念的无意识偏见的产物,它往往以共识的名义,为我们的社会思想与行为设定自然边界。作者由此提醒人们,“假如缺乏另类社会视角的童书,我们将失去什么?假如我们不教孩子通过不同视角的权衡……抵抗潜意识的审查,我们将失去改善当下境况的机遇。我们会被锁在一种无历史的幻象里,以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也将永远停留在我们对当下境况的理解中”^[8]。香农的文章提醒人们,为儿童写作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潜在审查,需要时刻予以反思。1988年,马克·韦斯特出版了《相信孩子:反对儿童文学审查的声音》一书,同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于贯穿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各环节的审查观念与态度的质疑^[9]。1996年,《世界文学类型研究》杂志出版专辑,围绕“儿童文学中的审查制度”,在全球范围探讨其历史与现实、状况与问题,相关论文揭示了童书审查制度与童年观及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历史和当下关联^[10]。

意识形态批评促进了人们对儿童文学审查制度的深入反思,同时也在儿童阅读的语境下日益培育起一种批判阅读的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儿童的文学阅读不再被认为是单向、被动地接受活动和影响的行为,而是一种充满批判性的主体能动行为,甚至以后者为主体。21世纪以来,这一批判阅读的观念逐渐成为儿童文学批评的主导观念。相比于童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可能对儿童读者造成的消极影响,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儿童阅读行为本身可能具有的积极潜力。

例如,乔·萨特里夫·桑德斯的《问题的文学:非虚构文学与批判的儿童》,探讨非虚构儿童文学中隐藏的意识形态问题,最终的目的是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倡导一种以非虚构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批判阅读观念与姿态。这也是为什么彼得·霍林代尔于2011年出版了作为《意识形态与童书》一书姊妹篇的《隐藏的教师:意识形态与儿童阅读》一书。该书延续并展开了霍林代尔在《意识形态与童书》末尾提出的课题,即面对童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儿童读者如何采用富于主动性的批判阅读,发现、思考、反抗、重塑童书中的意识形态内容。

这一转变带来了儿童文学阅读与批评观念的某种重大转向。众所周知,童书审查的传统建立在一种源自浪漫主义运动的与儿童有关的意识形态之上,即认为儿童是天真的、脆弱的,缺乏身体和文化上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不良的书籍必然会使儿童深受其害。如同马克·韦斯特所说,“纵观儿童文学的历史,那些对儿童书籍施行审查的人们,不论其意识形态背景如何,都怀着一种对书籍力量的相当浪漫的看法。他们相信,或者至少承认他们相信,书籍在儿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成人应对儿童阅读的每一个词语予以监管。由于书籍审查的倡导者赋予书籍如此大的力量,他们也就认定让儿童接触各式各样的书籍、信任儿童自己的阅读选择是件危险的事情,因而对此加以拒斥。那些审查童书的人们也许是偏狭的,但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是在保护纯真的儿童,促进社会利益”^{[11]689}。然而,通过主张和肯定批判阅读活动中儿童的主体性,通过在儿童文学的阅读中倡导一种批判阅读的观念与方法,文本作为意识形态熔炉的决定作用被淡化了,儿童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能动作用进一步得到认可。

由此,主宰着传统儿童文学话语的“儿童/成人”权力关系,也开始经历新的认识和演变。如果说长久以来,童书领域的意识形态审查既是成人保护、照料儿童的文化方式,也可能是成人“控制”“盘剥”儿童的文化途径,那么随着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关于儿童与成人关系框架的思考,则不断突破着既有的权力边界。

一是关于儿童能够以及应该阅读什么的理解。自西方儿童文学批评诞生以来,它对儿童能够和应该阅读什么,以及儿童文学能够和应该为

孩子提供什么,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这一认识下,现代儿童文学逐渐发展为一种富于限制性的文学样式。例如,性、恐怖、暴力等因素,长期以来被小心地限制在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与儿童读者的阅读目录之外。“我认为在一个孩子的阅读中,我们也许太倾向于让他避开生活的艰难事实。悲伤、失败、贫穷,甚至还有死亡,所有这一切只要诗学上处理得当,无疑都可以写给孩子看,而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总而言之,童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孩子领向在前方铺开的生活。如果这些书对世界的艰难只字不提,我不确定这么做对孩子是否公平。”^{[12]293} 佩里·诺德曼由此批评儿童文学一向被认为是一种与“不足”和“缺失”有关的文学^{[13]3-4}。与韦斯特和诺德曼批判的观念相反,一种受益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儿童文学阅读观念认为,儿童的阅读不应设定边界;相反,在儿童身上培育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文本展开批判阅读的能力,将有助于儿童获得更充分的文化权力。

或许也是受到这一观念和趋向的引导,21世纪以来,针对童书审查制度的一度激进的抨击,逐渐让位给了有关对童书批判性阅读的探索,后者致力于使儿童的阅读活动同时承担起敏锐、细致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职责,甚至以此为主要职责。至此,“批判”取代“欣赏”成为儿童文学批评与阅读的基本职责。与此相应,这类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给任何儿童文学文本设定新的艺术标准,而是期望促成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在童书领域的普及。

二是关于成为一个儿童意味着什么的认识。西方儿童文学界针对“儿童/成人”关系的审视和反思,始自针对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占据主流的纯真童年观的批评。韦斯特在《相信孩子》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这一童年观的质疑:“我不知道童年的纯真意味着什么。儿童是缺乏经验的,但他们并不纯真。童年可能是人生中一段糟糕的时光。没有孩子想一直当孩子。只有那些忘了这一切的大人才会说‘但愿我还能当一回孩子’。童年的幻想是成为大人。”^{[9]11-12} 与此构成呼应的是凯伦·科茨在《镜子与永无岛》一书中关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重读。在她看来,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并非像过去评论家们认为的那样,代表了童年无边的幻想和天真的欢乐。恰恰相反,爱丽丝是一个在成人话语的压迫下努力想要表达和言说自我的孩子。事实上,我们可能并不愿意成

为爱丽丝,因为爱丽丝意味着停止成长——不论在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她总是同一个爱丽丝,从不改变,而“孩子想要改变,想要成长”^{[14]43}。这类批评指向着当代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成为一个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意识形态批评的语境下,作为儿童文学写作主体的成人作家,始终是一种在意识形态的站位上有别于孩子的个体或群体。因此,一切出自成人之手的儿童文学写作,都存在着需要质询的空间与可能。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儿童文学文本内的“成人/儿童”意识形态关系,也进一步成为了更广大的社会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一部分。约瑟夫·左那多在《发明儿童:文化、意识形态与童年故事》一书中认为,“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史,是一个有关社会等级、压抑的愤怒、统治、屈从、暴力以及一种不惜以毁灭自我与他人作为代价的全力以赴的权力欲望的故事”^{[15]xiii}。它也是迄今为止的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有意无意地遵从并致力于表现的基本关系。“大部分儿童故事希望儿童认同其中关于儿童应该成为什么的成人观念,从而使得文本中成人与儿童的威权关系变得无可置疑。换句话说,儿童故事往往是一种成人宣传,意在促使儿童确认他与成人之间的等级关系。通过肯定在成人与儿童的微观关系结构中隐含的主流文化与其自身及它者的宏观关系,它们实际上复制着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现状。等级的高下隐含于成人和儿童的关系之间,主流意识形态为之提供潜意识的证明,使得以成人对儿童的关爱之名有意识地得到实施的那些长期而又不易觉察的权力与暴力,变得正当化。”^{[15]xv}在左那多看来,西方社会的“儿童”观念本身即是这一意识形态关系的结果与证明。因此,我们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反思与重塑的努力,必须从重思“儿童/成人”的意识形态关系开始。在左那多看来,这一反思的难度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深入骨髓而又不易察觉,它在儿童文化中的不断复制和加强,几乎是不可避免之事。作者显然不信任霍林代尔、斯蒂芬斯等研究者提出的批判阅读观念与理想,他认为最终除了认可生命作为存在本身的不安与危险,没有一种真正的批判能够逃出上述意识形态关系的罗网^{[15]219}。

在《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一书中,诺德曼表达了某种与左那多相近的悲观。他指

出,在儿童文学以“儿童”之名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断对它造成解构威胁的成人意识形态的阴影。它使得一切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似乎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然而,相比于左那多的激进与悲观,诺德曼一方面强调了儿童文学文本内成人意识形态话语的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则始终不曾放下对其展开质询与重塑的期望。如同诺德曼本人所陈述的那样,尽管时至今日,批评已经不再天真地相信通过文学就能改变世界,却仍然可以通过在读者身上培育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自觉,为文本面前每一个可能的儿童和成人个体,担负起有限却富于意义的职责^[16]。

这一批评的方向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儿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意义。如果说儿童文学本身永远无法摆脱成为一种以儿童为对象的成人权力话语的命运,通过批判阅读实现的儿童赋权最终也将是一个过于乐观的理想,那么对于儿童文学内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运作方式的揭示,其价值或许不在于抵达某个确定的批评终点,而在于寻求、建立某种不安的批评精神。在这里,书籍和故事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妥善安置,而仅仅是我们不安的生活与思考的开始。诚如麦克吉利斯所说:“让我们承认和肯定差异。让我们认可书籍中的意识形态支撑以及我们阅读时的站位。谁知道呢,也许只要坚持直面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阅读的文本中的那些矛盾,就能使我们在意识形态的重负下得到哪怕一点点解放。”^[17]

参考文献:

- [1] 彼得·亨特. 理解儿童文学[M]. 郭建玲,等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 [2] Robyn McCallum, John Stephens. Ideology and Children's Books[C]//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Shelby Wolf, Karen Coats, Patricia Enciso, Christine Jenkin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1.
- [3] B Dixon. Catching Them Young Vol 1: Sex, Race and Class in Children's Fiction[M].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 [4] Peter Hollindale.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J]. Signal, vol. 55, 1988.
- [5] John Stephens,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2.
- [6] Mary Lou White. Censorship—Threat over Children's Books[J].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74(1).
- [7] Perry Nodelman. Editorial[J].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83(1).

[8] Patrick Shannon. Unconscious Censorship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Children's Books[J].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87(2).

[9] Mark I. West. Trust Your Children: Voices Against Censorship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M].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88.

[10] Alleen Pace Nilsen and Hamida Bosmajian, eds. Censorship in Children's Literature[J]. Para. doxa: Studies in World Literary Genres, vol 2 (3-4), 1996.

[11] Mark I West. Censorship [C]. In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eter Hu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2] Edward Ardizzone. Creation of a PictureBook [C] // Only Connect: Reading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S Egoft, G T Stubbs, L F Ashley.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Perry Nodelman. Preface: There's Like No Books About Anything [C] // New Voic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Sebastien Chapleau, Lichfield: Pied Piper Publishing Ltd, 2004.

[14] 凯伦·科茨, 赵霞. 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审美批评的再探索——关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向的对谈[N]. 文学报, 2020-06-04.

[15] Joseph L Zornado. Inventing the Child: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Story of Childhood [M].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2001.

[16] Perry Nodelman. The Hidden Child in The Hidden Adult [J]. Jeunesse: Young People, Texts, Cultures, 2016 (1).

[17] Roderick McGillis. The Pleasure of the Process: Same Place But Different [J]. Children's Literature, 2000.

Ideology and Its Critical Potential in Children's Books: Evolution and Trend of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ZHAO Xia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have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1970s,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 has since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researchers represented by Peter Hollingdale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ai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the 1990s, researchers represented by John Stephens deepened the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study in this field. The originality of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typically reflected in the inspection of and thought on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largely chang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ren/adults" relationship in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culture texts in the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circle, and then rewritte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creation, reading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ideological criticism; child/adult; Western literature; critical thinking

(责任编辑 雪 箫)